



重庆大学80周年校庆献礼

W AIGUO
YUYAN WENXUE YANJIU JICUI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集萃

主 编 李 红 余渭深
副主编 黄赞琳 李良炎



四川大学出版社



重庆大学80周年校庆献礼

WAIGUO
YUYAN WENXUE YANJIU JICUI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集萃

主 编 李 红 余渭深
副主编 黄贇琳 李良炎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特邀) 徐 燕

责任校对:王 冰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集萃 / 李红, 余渭深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614-4566-2

I. 外… II. ①李…②余… III. ①语言学—外国—文集
②文学研究—外国—文集 IV. H0-53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667 号

书名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集萃

主 编 李 红 余渭深
副 主 编 黄贇琳 李良炎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566-2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5.375
字 数 30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序

名庠重大庆八旬，
棣星门下聚才俊。
黉宫弦歌傲九州，
蓄势待发志超群。

重庆大学于1932年设立外文系。几经变迁，数易其名，至今重庆大学外语学科已经度过了七十几个春秋。岁月峥嵘，业绩不凡，外文系在重庆大学校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重庆大学外文系名师荟萃，俊才聚集。有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吴宓教授，他的师道师德备受海内学界尊崇；有翻译界耆宿、知名作家叶君健教授；有师从Daniel Johns、我国英语语音学研究领域的泰斗周攸成教授；有长期从事语言教学、潜心进行英汉语言对比研究、成果颇丰的欧治梁教授等一大批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他们治学严谨，学有专长，春风化雨，有教无类。在他们的精心培养，潜移默化下，重庆大学外文系人才辈出，不乏外语界、翻译界、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刘炳善教授为其中佼佼者，他著作等身，涉笔甚广，所著《英国文学简史》，是国人用英文编写的首部英国文学史教材；江家骏教授在语言、文学方面造诣颇高，对英诗有独特研究，曾在美国大学任客座教授。

由于院系调整，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重庆大学英语专业停办，外语学科成为公共外语。一大批外语素养高的教师，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教书育人，淡泊名利，为重庆大学的外语教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是重庆大学外语学科沧桑巨变，高歌猛进的30年。恢复了外语系，组建了外语学院，增设了语种，成立了研究所，拥有五个硕士点、一个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此期间，任教的老师与毕业的校友，志存高远，学海求索，表现出色，新秀脱颖而出。教学上，锐意改革，诲人不倦，成绩斐然；科研中，着眼前沿，深入探讨，硕果累累，为我院在全国外语界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重庆大学贡献。

与此同时，一批蜚声全国外语界的专家学者，如胡壮麟教授、徐盛桓教

授、钱冠连教授、沈家煊教授、周流溪教授、赵毅衡教授、王寅教授、王初明教授、周昌乐教授、陈众议教授等相继应聘重庆大学兼职或客座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举行学术报告。这些学界翘楚的学术活动，开阔了我院师生的视野，丰富了知识，为提升我院学术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书撷英集萃，汇集了 23 位教授的简介与论述（涵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英美文学等），旨在弘扬他们的治学、师道、人品、情操，以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由于容量有限，未能广收我院教师、校友的著作，深表歉意，敬希鉴谅。

韩其顺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9 年 7 月

目 录

在重庆大学念书	刘炳善 (001)
论罗色蒂女士之诗	吴 宓 (010)
Foreword	周致成 (019)
翻译也要出精品	叶君健 (025)
汉语外来词译名的倾向性	欧治梁 (029)
译林语丝	韩其顺 (034)
感受教学相长 促进教学提高	江家骏 (044)
重返玫瑰园	罗信群 (051)
闲话“整合”	胡壮麟 (063)
转喻语句与真值条件	徐盛桓 (072)
研究型读书法	钱冠连 (085)
漫谈诗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姜治文 (092)
三个世界	沈家煊 (103)
诗歌格律综览	周流溪 (115)
欧洲: 破碎之美	赵毅衡 (128)
语言学新增长点思考之五: 本土化的合璧式创新	王 寅 王天翼 (132)
论外语学习的语境	王初明 (145)
Computational Mechanisms for Metaphor in Languages: a Survey	周昌乐 杨 芸 黄孝喜 (157)
论情节与主题	陈众议 (186)
大学专业英语的测试信度与效度研究	黄 萍 (196)
L2 语音语际迁移的多维解析	王鲁男 (203)
第二语言语义提取中的词汇知识效应	李 红 (214)
概念转喻与语篇衔接	魏在江 (227)

在重庆大学念书^①

刘炳善

我的母校重庆大学建在嘉陵江边，校园环境优美，其中有些建筑和道路至今仍清楚记在心里：理学院是中国传统的飞檐大屋顶古典建筑，工学院则像一座西欧的中古城堡；1931年建成的重庆大学理学院文科各系的学生上课和课外活动以小山头松林坡为中心，松林坡下自然形成了一条腰带似的环状小马路，是同学们散步之地。到了傍晚，男女同学在此谈情说爱，路旁卖“担担面”的小贩表示凑趣，在担担面里放进两个“抄手”（馄饨），叫做“鸳鸯面”，因此这条小路也被戏称为“鸳鸯路”。松林坡俯瞰着中央大学复员后所留下的大礼堂，是同学们演戏、唱歌的舞台场地。理学院门外的大操场既是运动场，也是新中国成立前重庆学生运动的中心。松林坡附近的学生饭厅门口有一片“民主墙”，是大家自由发表意见的园地。

（一）

我于1946年暑假考入重大中文系。上中学时我的数理化没有好好学，只凭一篇作文录取的。主考官是著名古音韵学家张世禄。口试时他问我最喜欢哪一篇文章，我答：荀子《劝学篇》。他让我背，我一紧张，一句也背不下来，连开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都忘了。但还是录取了。当时中文系初创，请了两位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即张世禄和古文字学家商承祚。他们的讲课内容都忘记了，但是记住了他们的风度和各自在课堂讲的一件事：张先生身材高大，说话幽默；他说在古汉语里有像英文中play这样的复辅音，并举了古汉语中“笔”音“不律”为例。商先生个子瘦弱，面相清癯，谈吐文雅；他说甲骨文中的“僕”字上带了一串啰啰嗦嗦的东西，原来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有一次坐汽车，在半路上“抛锚”，看见司机的助手修车，腰间别着一把鸡毛掸子，这才恍然大悟：甲骨文“僕”字上那一串东西可能是当时奴仆做家务劳动时所经常使用的工具。张、商二位老先生是各自专业的头号权威。他们在抗战期间滞留在大后方，日本投降后复员经过重庆，被挽留下来，但都只在重大中文系教了一学期就离开了。

我自己在中文系也只读了一年，而且主要的活动是跟爱好新文学的同班同

① 本文写作于2006年10月7日。

学张存志等人组织了一个“野风文艺社”，出壁报《明天》，演话剧《沉渊》（林柯作），还参加“海风合唱团”，总之，兴趣在于课外活动。当时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到街上的沙坪书店，把香港出的《王贵与李香香》一口气站着读完，回到学校凭印象画了16幅连环漫画（当然无法和后来周令钊的那一套插图相比），发表在我们的壁报里；可惜只在松林坡下的报栏里登了一天，夜里就被人撕掉了——大概是特务学生干的。

有件事值得在此一记：约在1947年上半年，朱自清先生曾在重大校区的基督教青年会作过一次讲演，我去听了。讲的内容是当时白话散文的两种风格，举何其芳的散文和冯雪峰的散文著作《市风和乡风》为例，前者风格清新明快，后者行文晦涩而有哲理意味。朱自清先生身穿黑色旧西装上衣，说话声音不高而条理清楚，是名教授兼名作家。当时我刚读过他的《伦敦杂记》，非常喜欢。他到重大讲演，可能是从西南联大复员回北平路过被邀。

（二）

1946年底，圣诞节之夜，发生了“沈崇事件”：北大女生沈崇被一个美国兵强奸。全国各大城市爆发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从这时到1947年上半年，我投入重庆市的“抗暴”运动。重庆大学的抗暴是由几个进步学生酝酿发动的。张现华、潘青、王永毅等同学在基督教青年会一间房子里开会，我也被约参加了。张现华（后来担任重大学生会主席），一个个子细高的山东小伙子，微笑着说：“我们在这里开会，那些没良心的人（指特务学生）也在那里开会！”王永毅（后来知道，他属于民盟）说：“这次抗暴运动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我仅在会后参加了抗议书的签名活动（后来这份抗议书登载于重庆的《新华日报》）。由于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打内战，学生们普遍对国民党不满，加上驻华美军以胜利者自居，在中国横行霸道、奸淫妇女的事件多次发生，“沈崇事件”成为导火线，抗暴运动一触即发。重庆市的大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冲向市区，市民蜂拥街道两边观看助威，还为学生们提供饮食。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游行到闹市中心时，“中华剧艺社”的演员们抬出了一大筐橘子和面包。（30年后我偶然碰到该社的演员彭湃同志，他告诉我：这些橘子面包是他们节衣缩食，用省下来的钱买的——当时的进步演员也都很穷。）游行中最吸引群众的是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学生的表演节目。他们运用“王大娘补缸”、“赶旱船”等民间形式演出讽刺国民党政府投靠美帝、丧权辱国的内容。有一个“打连箫”（北方叫“打花棍”）的节目唱道：“有一帮人最可耻，他给洋人当舅子，跟在洋人屁股边，吐把口水他说甜！”唱得大家哈哈大笑。

接着成立了“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联”。“抗联”出了一种小报《抗联通讯》，编辑部设在化龙桥育才学校。我参加了编辑工作，

因此认识了育才的学生苏觉和王轶伦。(王轶伦患有严重肺病,编辑小报时在一起吃饭,我不小心受了传染,也患上肺病,1949年秋发作,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治疗,直到1970年才“钙化”。这是后话。)

1947年上半年是重庆学生运动的高潮,到1947年6月1日晨,国民党就在全中国各大城市对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报复性的大逮捕。仅在重庆一地就逮捕了大中学生、教师、记者一百多人。6月1日那天大清早,武装特务到重大学生宿舍按校内特务所提供的黑名单抓人。同学们都惊醒了。特务们押着被捕同学从松林坡下走过,我们大家呼喊着急追,追到附近的西南工专校内,特务开枪,大家才停止追赶。

重庆大学的同学中被捕的有张现华、王永毅等。同学们进行了营救活动,敦促学校当局出面向重庆市政府交涉放人。在全市各界人士的抗议声援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大部分被捕人员释放,但仍狡猾地扣留下学生运动中的少数骨干,张现华同学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关在中美合作所的监狱中,直到重庆解放前夕,于1949年11月下旬在特务大屠杀中牺牲。

(三)

至今我还留有在参加这些爱国学生运动中关于进步同学们之间的亲切回忆:一件事是在准备大游行时,大家都到理学院的礼堂去写标语、画漫画。我画了一大张美国兵的丑态,因为技术差,画得不好,没有被采用——这倒不必说它。我还写了许多标语,后来也完全没有用。标语内容是按照学生会拟定写的,为什么不用呢?当时思想不通——等于白忙活了几夭。后来一想,明白了,是因为我写的是一种“小孩儿字”,让特务一看就认出是我的笔迹。因此,主持游行宣传准备工作的高年级女同学黄英大姐,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就完全不用。但在我兴致勃勃画呀、写呀的时候,她在旁边并不阻挡我的“积极性”,只是默默地看着——完全出于好意。另一件事,是在声援营救被捕同学的晚会上,我朗诵了自己急就的一首诗。这诗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了,反正都是抗议反动派抓人的口号——这也不值得多说。留下的温馨回忆是,我朗诵诗歌后留在后台,和两位同学守摊,等待晚会结束:一位是化学系女同学曾紫霞(后来知道她是刘国志烈士的未婚妻),另一位是教育系女同学叶孟君。曾紫霞像一个姐姐,叶孟君年龄小,单纯而老实。我们三人小声说些闲话打发时间。叶孟君说了个很文雅的谜语:“花已化成灰,秋风半边吹,夕阳一点向西垂,相思心碎,怕是马蹄归!”打一宇。我一点一点猜,只猜出一部分,但凑不成整个的字。她说是(繁体的)“蘇”字。进步同学们之间,为共同追求解放的理想而一同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相处中有一种像兄弟姊妹一般的纯洁情谊,虽然现在已事过整整60年,仍然感到怀念。

但是,时过不久,叶孟君同学突然失踪了!据当时进步同学之间传说,情

况是这样的：叶孟君在进步同学当中虽然显得性情温和单纯，她其实是一个疾恶如仇的女孩子，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有话就直说出来。这种性格在那种特务如毛的险恶环境中是很容易遭敌人暗算的。在她那班里有一个跟特务关系接近的女生，从事破坏学生运动，叶孟君常跟她争吵。那个女生怀恨在心，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使国民党特务把她绑架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深感痛惜；苦苦思索之后，写了一封抗议信，到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张群的本家亲戚）住宅，叫开门，把信交给一个女仆，信中礼貌地请张洪沅出面营救，但此信如石沉大海，毫无下文。从此叶孟君就消失了。

几十年来，我以为她已遭到不测。但到 20 世纪 80 年代，偶然从《重大校友通讯》所刊登的重大“六一社员名单”中发现她仍然健在，这才放下了几十年来心上的一种负担。叶孟君同学是四川崇庆人。那么，遥祝这位共同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老同学一生平安吧！

（四）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学生运动和用功读书的互相交错中度过的。这就是说，出于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心、正义感和对于民主、自由、解放的向往，凡有爱国进步的学生运动，我一定自觉、积极地投入——虽然仅仅是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参加，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一旦学生运动的高潮过去，我又以旺盛的求知欲投入用功读书的生活。这本来是一个青年学生很正常的两个方面。当然，还有第三方面，那就是对于幸福爱情的憧憬——不过幸福爱情可遇而不可求，而且对于我这个从十二三岁就逃难出来的流亡学生来说，是一种奢望。

我在重庆大学，前后共读了一年中文系、两年外文系。在中文系，我的主要活动是与好友张存志（自流井人）参与组织“野风文艺社”。对于功课，包括张世禄和商承祚两位大师的课，乃至系主任颜歆教的朱光潜《文艺心理学》，都没有好好听了。只是对于郭子钧老师教的中央大学编的大一英语好好听了。当时我做的是“作家梦”，想提高自己的英文程度，通过英文阅读外国文学名著，以便学习文学创作的本领。因此我对于郭子钧老师所教的大一英语（Freshman English）情有独钟。郭老师听口音好像是南京人，当时只是助教，但他教书认真仔细，我也读得很起劲。课文都是 20 世纪的英国散文和短篇小说，其中的 *Sunday Before the War* 和流浪汉作家 W. H. Davies 的小说，我都能背。郭老师在堂上说过一句话：“You are hard workers. I must be a hard worker, too.”（你们用功，我也得用功。）我认为他看过我的作文，冲我说的，心里很得意。

1947 年秋，我干脆转入外文系。在外文系，我对功课比对中文系的功课更加重视。但我不把功课看得高于一切，我更重视课外的自由阅读。自由阅读

范围很广，还包括自己所十分爱好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社会科学著作和通过《新华日报》报童送来的革命文件《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等等。在英文方面，我苦于自己掌握词汇量太少，只能逐步提高读英文书的能力。一开始我读英汉对照的英文小说，如高尔基的 *Twenty-Six Men and a Girl*, *My Fellow-Traveller*，德国反法西斯作家 F. Wolf 的 *Jules*，苏联历史剧 *Field-Marshal Suvorov* 等，认真查字典。进而读英国的儿童文学原著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和狄更斯的 *A Child's History of England*，都读得津津有味。第一部正儿八经的英国名著则是 Goldsmith 的 *The Vicar of Wakefield*。为了攻破生字难关，我往往把生字一个一个查出、写到本子上，工夫下得不少。但后来发现：仅仅把生字抄下来并不是好办法。（这只能安慰自己：我把它们抄下来，大概记住了！）根本的办法是多读原文书，遇到不懂的地方查字典，通过多读，头脑中长期积累，提高阅读能力。

在进修英国文学方面，日籍爱尔兰作家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和我国英语界前辈范存忠先生对我影响较深。前者强调英文《圣经》“钦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在英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促使我以一年的工夫攻读此书，并以其中一些部分与中国的古代经典比较；但我只是把英文《圣经》当作文学典籍来欣赏，并不相信基督教，这是与教徒对待《圣经》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正如我也爱读中国古书但并不相信儒教一样。范存忠教授的《英语学习讲座》一书对我从一般英语学习过渡到学习英国文学起了一种桥梁作用。特别是书中所讲的斯蒂文森如何通过模仿阿狄生的文章学习写作、康拉德如何从一个波兰水手通过艰苦努力成为一个英国小说家的故事，曾对我触动很大，使我曾想学习用英文写作。为此我把平时阅读英文作品最喜欢的几十段诗文片断背诵下来，发现这对于我的英文作文大有帮助，最后的结果则是在 1952 年所写的一篇英文短篇《逮捕》，描写重庆“六·一大逮捕”中的一个事件，获得世界学联的征文一等奖——但也仅此而已，至于以英文写作为事业，谈何容易？

现在想来，我在重大最高兴的事，是坐在工学院门外，嘉陵江边的石栏上细细品读《金库诗选》、《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彭斯的歌谣——打下了我一生喜爱英国文学的基础，这就够了。

（五）

在我生平，中学老师对我影响最大。这可能因为，一方面，人在少年时代头脑最单纯，上进心强，热爱学习，另外因年龄关系，对老师的依赖性大，在不知不觉中受他们熏陶；另一方面，当时也确实遇到几位品德高尚、思想进步、业务过硬、多才多艺的老师，他们以大公无私、任劳任怨的精神爱护我们、培育我们。因此，可以说我一生中思想和事业两方面的根子在中学时代已

经扎下了；此后的几十年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随着年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和具体化。在这方面我已写过文章，此处不再重复。

大学老师当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外文系的吴宓和朱文振。关于吴宓先生，我已写过回忆文章，现在只谈朱文振先生。

朱文振先生是著名莎剧翻译家朱生豪的兄弟。他在1950—1951学年教过我们英国文学史，用的是美国 Neilson and Thorndyke 编的教材。现在还记得他在班上用稳重而低沉的口吻一字一句复述《贝奥武甫》(Beowulf) 故事的情景。但英国文学史只讲到乔叟就停止了，因为1950年冬天我们都下乡到沙坪坝附近的农村，去参加土改前的减租退押运动。运动结束回系，文学史也没有继续，他改教英文作文。现在想想他在课堂上并没有教我们很多东西，他对我的影响主要在于课外的潜移默化。

朱文振先生跟他那著名的兄长一样，都是典型的江南读书人。他学养有素，中外兼通，温文尔雅而又坚毅执著，在教书和著译两个相辅相成的领域中耕耘一生。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学生，对于他这样清寒自守的老师深为敬佩。他教我们作文课极为严格认真，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关于教学方法，记得好像是贝多芬说过：善于教钢琴的人，当学生正弹得兴会淋漓时，不要因为一些小错而不断打断他，以便让他保持旺盛的学习劲头，最好在他弹完之后再从大方面给以指点。我还听一位老教授谈过他改学生英文作文的秘诀：可改可不改——不改。但朱先生改作文的方式却恰恰相反：一篇抄得整整齐齐的作文交上去，下周上课发还时，本子上勾勾画画加上改写，已经面目全非，而且在文章末尾还有他密密麻麻写下的一大段批语。这说明他在每一篇学生作文上都花费了许多心血，对于文章中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妥之处”都不放过，都要改掉。他自己是如此严格认真，如此吃苦，却并不讨学生的好。至少就我个人来说，看了他改过的作文后，写作的兴致就被打消了一大半。但朱先生对学生也不乏幽默感。有一次他监考，时间结束了，同学们还拖延着不肯交卷，他耐心等待一会，同学们还不动，他笑着说：“各位大文豪，请交卷吧，好不好？”大家也笑着交卷了。他的微笑很有特点：那是极儒雅的、冷隽的，稍含一丝嘲弄的意味。我感觉他是一位正派认真的学者，他对学生严格完全是出于好意，所以在课外有时找他聊聊。

朱先生当时住在重大的教师宿舍“行字斋”，环境幽静而荫凉。房间设备简陋，只有一桌一椅一床，是典型的书生寒斋。在靠窗的书桌上摆着一部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简明牛津词典》)，并非原版，而是抗战期间龙门联合书店的土报纸影印本，好像雨水泡过似的，纸页膨胀了，厚厚的，像一块四四方方的大松糕，封面还用纸粘补过——看来用得很有些年头了，这是他最常用的工具书。书桌上还放着一摞莎士比亚戏剧的译稿。谈得高兴了，他就向我介绍他翻译莎剧的经过。那时其兄朱生豪译的三大卷莎剧集早已由世界书

局出版，未及译出的几部历史剧由他续译出来，而他正在认真完成亡兄的嘱托。他让我看那些灌注着他心血的译稿，那是他最神圣庄严的事业成果，我对此只有感到敬佩和叹服。但从他谈话中，我也感到他似乎并不以其兄的译法为最好，仿佛打算先把缺译的历史剧补足，然后再用自己的方法重译莎剧全集。原来他认为莎剧从写作时代和语言特点来看，应该采用中国传统的戏曲语言，即从元明杂剧、昆曲、京剧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来译才合适。他为贯彻自己的这种译莎主张而日夜辛勤工作，对于自己译稿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誊抄。

从朱文振先生身上，我仿佛看到他的胞兄朱生豪怎样在家乡沦陷的艰苦条件下，躲在乡间默默从事莎剧翻译的一部分身影。他们兄弟二人为学术事业、为莎剧翻译而执著献身的精神是一致的。但他们工作的结果却因时代背景的差异而大大不同。朱生豪由于他在抗战前与世界书局有老关系（他曾参加缩写世界书局所出的《英汉四用字典》），并在1935年就与世界书局签订了《莎剧全集》译本的出版合同，他的莎剧译稿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空档”中得以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两次出版，辛劳的成果总算完整保存下来，足以寿人寿世。朱文振的译莎结果却没有这样幸运。据我所知，他补译的几种历史剧业已完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莎剧译例》也发表于《翻译通报》。但他那采用中国传统戏曲语言翻译莎剧的主张没有得到当时学术界的理解，因而他的几部译稿也未能出版，最后全在“文化大革命”中毁掉。我认为这是学术上的一种损失。因为，以莎剧之博大精深，以中国新旧戏剧形式之多种多样，尽可以根据“百花齐放”的精神，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翻译。朱文振的译稿倘得保存下来，说不定会提供一种有独特风格的“另类”译本，有助扩展译莎的思路。

无论如何，朱氏兄弟身上都体现了对于学术事业的虔诚庄严的追求。

（六）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我参军当了半年多的宣传兵。1950年秋，因肺病发作，又回重大外文系复学；除了在1950—1951冬春之交作为工作队员参加一段农村减租运动，我仍想继续学习英国文学，主要想攻读莎士比亚，但对于他的原文全集只读了四五个剧本，感到语言太难，又缺乏详注的好版本和工具书，只好中断，但心灵深处留下一个有朝一日一定要读懂莎士比亚的愿望。

这时候系里来了几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新老师。我在课外对他们一一拜访。

有一天，教作文的陈楚珩先生问我平时读过什么书？我说我读过英文Bible。她说从作文看，我还读过别的什么。我说我读过Macaulay的*Life of Samuel Johnson*（《约翰生行述》）。她大不以为然，说：“Macaulay? Historian! You should read Arnold, Matthew Arnold!”（麦考莱？历史学家！

你该读阿诺德，马修·阿诺德！）于是她立刻从书架上取下美国 Charles Scribners 出版的一本阿诺德批评文集，借给我看。我仔仔细细拜读了 *On Translating Homer*（《论翻译荷马》）等等。阿诺德确实是学问渊博、深思熟虑的雅士，对资本主义社会、“维多利亚盛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唯利是图、粗俗聒躁的市侩主义（Philistinism）深致不满，而文风优美蕴藉、淡而有味。他的批评论文是值得让人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氛围之中，在明窗净几之间慢慢品读、细细琢磨的好文章。与之相比，麦考莱的书就稍嫌不足。麦考莱的优点在于文笔流畅生动，他的书一掀开就吸引人读下去，直到篇末；但是读后想想，他写的内容肤浅，给人留不下余味。此外，批评家对于他写的历史和传记中的政治偏见也表示不满。尽管如此，碰到他的文章，由于文字中的吸引力，我还是爱读。这种思想不深刻，甚至内容也有偏差，但文字生动而不枯燥的散文作家，在中国也是有的，不必当做经典，只当做一种散文读读，大概也无碍大局。

我还去找过从美国归来的王棣先生。他向我推荐法国文学，特别向我推荐伏尔泰的 *Candide*（《天真汉》），把他的一大本印得很漂亮的欧洲文学选读借给我。我明白他是向我启蒙，想让我除了绅士气太重的英国文学，思路开放一点。但我那时还欣赏不了伏尔泰，以为他只是哲学家。那时我最欣赏的法国作家是法朗士，特别是他的《泰绮思》（*Thais*），以冷隽智慧的笑声摧毁了假正经、假道学的伪善面具。小泉八云所译的他的《波纳尔之罪》我也非常爱读。至于王先生向我推荐的 *Candide*，多年之后我读了，而且也很欣赏——它确实是一部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启蒙小说。

另一位刚从美国归来的欧冶梁老师教我们口语。他特别欣赏丘吉尔的口才，向我们放过丘吉尔在美国国会的一次讲演，大概就是所谓“富尔顿演说”吧。我现在还记得丘吉尔用老年人含混重浊的口音说出的“from time to time”这个短语片断。不过那时我对丘吉尔没有好感，一则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中国的抗战不但没有帮什么忙，还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什么“该大国作战不力”云云；二则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镇压过希腊人民的反法西斯游击队，而且在镇压之后还坐在坦克车伸出两个指头做“V”字状，炫耀自己的胜利。刚解放时没有读过《毛选》，我还不知道他在英舰“紫石英号”干涉南京解放时所发表的言论，否则我对他还会更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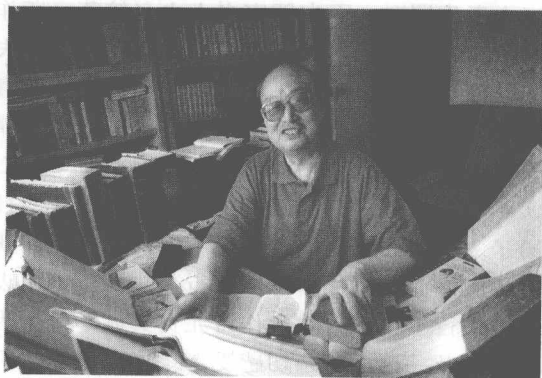
应该说，这些老师对我学习英文都有一定帮助。但我从抗战开始到1951年一直作为流亡学生从河南到陕西、从陕西到甘肃、从甘肃到四川，整整流浪十来年。到1951年暑假，我下决心回到北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从重庆大学休学北上，到北京去报考北大转学生。

潜心钻研莎学 编成煌煌巨典

文学翻译的关键在于：中外文素养+文化修养+社会责任感

——刘炳善

刘炳善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杰出校友，1927年11月出生。笔名李而文，河南郑州人，中共党员。1951年7月肄业于国立重庆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1948年起历任重庆北碚勉仁中学英文教师，解放军二野九十三团宣传员，重庆大学外文系学员，郑州回民中学、第三中学教师，中共郑州



市委宣传部文艺干事，河南省文化局戏改会戏改干部，河南大学外语系教授，河南大学莎士比亚与英国散文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理事，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会员。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出版著作与译著有《英国文学简史》（初版）、《英国散文选》（上、下册）、《圣女贞德》（肖伯纳历史剧）、《逮捕》、《伊利亚随笔选》、《中国文学漫笔》、《英国文学简史》（新修订版）、《英国文学常识入门》、《异时异地集》、《书和画像》、《伦敦的叫卖声》、《亨利五世/亨利八世》、《兰姆絮语散文》、《英国文学漫话》、《伍尔夫散文》、《译事随笔》、《刘炳善译文集》、《兰姆经典散文选》、《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等。其中译著《伊利亚随笔选》获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三等奖，《〈世界文学〉和我自己》获北京《世界文学》征文二等奖，《英国文学简史》获河南省教委优秀教材奖，英文小说《逮捕》获“世界学生新闻”征文一等奖，《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获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刘炳善译文集》获河南省优秀图书二等奖。另外还在《中国翻译》、《读书》、《世界文学》、香港《中国语文通讯》、《英语世界》等期刊上发表数篇文章。

论罗色蒂女士之诗^①

吴 宓

按英国文学史上之女诗人，以白朗宁夫人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9—1861) 与罗色蒂女士 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1894) 并称。二人者生同时，而白朗宁夫人之名较著，所作亦较多。顾论其人之情性品格及其诗之真正价值，则罗色蒂女士实在白朗宁夫人之上。所以然者，白朗宁夫人志气豪迈，精力弥满，不甘以女子自居，而喜效法男子之所为。其用情于白朗宁也，则私奔同逃，不自以为非。其以诗写情也，观其所作葡萄牙歌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 自明。但自状其情之暴烈坚强，如长江大河，冲荡横决，弗能抑止，实不类女子自述。至其诗中之材料，则政治社会之问题，科学宗教之思想，凡男子之所萦心而从事者，无不搜入，侃侃而谈，申申以指。其智力之广博，固可惊服。而其矫揉作态，强行追步，言不由衷之处，则未能或免焉。

夫行事首宜自然，作诗尤贵真诚。既生为女子，则当以女子天性中最高贵之处，及一己之所亲切感受者，形之歌咏，召示吾人。此等诗且非其他男子诗人所能为。其为希世之珍，传后之宝，可断言也。由此以论，罗色蒂女士夔乎远矣。女士者，英国诗人兼美术家但丁·罗色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1928—1882) 之妹也，性温淑而诚挚。其诸兄皆慧而好学，而但丁·罗色蒂倡立所谓“前拉飞叶派”文艺运动 Pre-Raphaelite Movement，尤为当时闻人。家中所往来者，莫非少年文士，纵意尚情，沉酣自喜。女士居则燕处超然，恬静自持，然早岁已以工诗著称。盖其性实和厚而品尤高洁，虽蓄情至深，而慎其所发也。年十七，有柯林生 (James Collinson) 者慕之，思与为婚。柯林生业艺术，才具平常，亦女士之兄之友。其家本耶稣教，早岁改入天主教。旋以爱罗色蒂女士之故，知教派不同，难谐婚配，乃重返于耶稣教。然女士颇轻之。盖以宗教信仰，其事何等高贵重大，安可以爱一人之故，率尔改变。已而柯林生愧悔不自安，遂复入天主教。至是而女士乃毅然与之断绝，时女士年十九也。

越数年，女士又识其兄之友凯莱 (Charles Bagot Cayley)。凯为剑桥大学出身，绩学书生，不谙世务，和厚而沉默，与女士实为佳偶，且相爱极笃。居久之，婚期在迩，而女士忽与决绝。其绝之也，非有所不满，且爱之之心丝豪

^① 本文节选自《论罗色蒂女士之诗》，原载于《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未减。只以女士天性高洁，视人间种种，终带污秽尘俗气，而又过于矜慎。平居温恭以事上帝，属顺自保，终觉婚姻之事，其中有无限蹈危履险之处，忧疑悚惧，不能自决。又若冥冥之中，时有止其前而招之返者。女士为求其心之安而行事一生无悔，故不惜牺牲一己及凯莱之爱情及幸福，譬诸悬崖勒马，前途渺茫，静止以待天命，其心非不欲长驱而直下也。女士与凯莱绝时，年方三十。虽与其人绝而心实爱之，且爱之终身不减，自少至老。常若有用情不遂，思嫁其人而不得之感。此种深挚之情，幽凄微婉之意，一见之于其诗。今兹所译《愿君常忆我》(Remember)之诗。即，与凯莱绝后不久所作，而自道其诀绝时之心情者也。

附录

愿君常忆我

Remember (1862)

C·罗色蒂女士 作

吴宓 译

Remember me when I am gone away.

愿君常忆我 逝矣从兹别

Gone far away into the silent land;

相见及黄泉 渺渺音尘绝

When you can no more hold me by the hand,

昔来常欢会 执手深情结

Not I half turn to go yet turning stay.

临去又回身 千言意犹切

Remember me when no more, day by day,

絮絮话家常 白首长相契

You tell me of our future that you planned:

此景伤难再 吾生忽易辙

Only remember me; you understand

祝告两无益 寸心已如铁

It will be late to counsel then or pray.

惟期常忆我 从兹成永诀